

○引进与诠释

编者按:语言是20世纪以来的时代标记,语言是研究人及人的世界的理想切入点,因此语言哲学成为现代学术界的宠儿。本刊将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全力搭建理想平台。本期刊发崔凤娟的《先验符号学中的语用思维——论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哲学观》和王晓阳的《尤尔琴科语言哲学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希望在传统挖掘中捕捉到中国语言哲学发展的阿基米德点。

先验符号学中的语用思维^{*} ——论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哲学观

崔凤娟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大连民族学院,大连 116605)

提要:阿佩尔在批判地吸收奥斯汀、皮尔斯、莫里斯等人的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融合先验哲学、解释学、分析性语言哲学、实用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先验语用学思想。先验语用学将先验性与语言使用维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以“语用学转向”最终完成哲学上的“语言转向”。这不仅拓宽了语言哲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其研究方法成为当代语用学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2-0013-5

Apel's Philosophy of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Cui Feng-jua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605, China)

Based on the work of Kant, Wittgenstein, Austin, Pierce, Morris and so on, Apel put forward his philosophy of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It is an integration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hermeneutics, analytic philosophy, pragmatism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as the token of the ultimate completion of linguistic turn in philosophy, organically combines transcendentalism and the pragmatic dimension of language. This broadens the horizon of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Meanwhile it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lay a soli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modern pragmatics.

Key words: apel;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pragmatics

德国哲学家阿佩尔认为,20世纪哲学已经完成了从近代的“意识分析”到现代“语言分析”的“语言转向”。几乎20世纪所有哲学家都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语言是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决定性条件。他指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阿佩尔 1997: 108)。正是在这样的理论

背景下,阿佩尔力图融合以英美为主体的分析哲学和以欧洲大陆为主体的人文哲学这两大长久对峙的传统理论,建立一种高度综合性的“先验语用学”。本文拟从先验语用学的理论基础、内涵等方面探讨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哲学观。

1 先验语用学思想溯源

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思想是融合先验哲学、

*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西方语言哲学的当代语用学建构与发展”(L07DY017)的阶段性成果。

解释学、语言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其中,康德的先验哲学、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分析哲学中的语用趋向以及皮尔斯和莫里斯的传统符号学理论是形成其先验语用学思想的活水源泉。

1.1 奥斯汀、塞尔等人对阿佩尔的影响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言语行为是语言交往的最基本、最小的单位”(Searle 1969: 16)。奥斯汀早期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认为,一个句法和语义都很确定的话语,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其意图,还必须诉诸说话者(包括听者)所处的特定的情境条件。对言语行为而言,可理解的必要条件不仅是言语的语法规则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说话者所处的特定的语境。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句意义对言语行为情境的依赖性,即是对语用学的一种强调。塞尔在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新分类的同时还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为了深入界定言语行为的概念,塞尔引入了意向性概念。他认为语用学话语不仅仅是一种言语行为,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说话者的心声,这种心声构成了话语的意义,在意向状态中,我们在说话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意向转移到本身并无意义可言的声音和符号中去了,正是意向性这种精神状态的特征,使得语用行为成为可能。意向性和行为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解释结构(张今杰 林艳 2005: 55)。奥斯汀、塞尔对言语行为的情境和用法规则以及意向性的强调和重视,实际上是对语用学维度的强调。其实阿佩尔早就意识到,在语言分析哲学内部和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皮尔斯的实用主义那里早都有了语用学转向的趋向。这成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核心概念主体间性的重要理论源头。

1.2 皮尔斯和莫里斯的传统符号学理论

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对阿佩尔先验语用学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其思想的基本前提。皮尔斯在研究亚里士多德及康德的范畴说基础上在现象和实在间作了区别,将感觉状态、无生命事实和符号表征分别称为第一项(firstness)、第二项(secondness)和第三项(thirdness)。由于语言使用的规则只有当人类能够使用符号时才能被获得,皮尔斯将符号区分为图像(icon)、标记(index)和象征(symbol)三种类型并分属三项。由此,皮尔斯的符号三元论将抽象观念、客观对象和解释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代替了传统的符号

二元关系。符号联系的三元性构成了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最基本主题。皮尔斯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一种不能被还原为二元关系的三元关系。这种符号结构的非还原的三元性对于理论和实用层面具有确定而广泛的影响,它指导我们更充分地理解人类通过口头表达和非口头表达的行为,以及在指示意义上的所有非人类行为(李红 2002: 48)。皮尔斯阐发的三位一体的符号观念进一步由莫里斯等人作了发挥。莫里斯明确地提出了符号学研究的三个层面,即语形、语义和语用(江怡 2007: 1-9)。莫里斯所说的语用学实际上是一种行为主义语用学。他从实用主义的社会行为理论出发,强调符号与社会行为的关系。阿佩尔认同皮尔斯等人的符号三元论思想,他将存在看做以符号为中介的解释世界过程中的可能对象,将整个的三元符号关系看做哲学的首要问题(Apel 1994: 119)。但同时他认为,皮尔斯的符号学是科学主义和机械主义的符号学模式,而莫里斯的符号理论则是从经验行为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语用学,这种语用学并不能充分揭示语形-语义体系中的语用维度。正是在批判地吸收美国实用主义符号学理论基础之上,阿佩尔主张一种先验解释应当指派给我们实际语言使用的语用域,强调了符号关系中的语用学维度。

2 先验语用学框架中语义学与语用学的融合

阿佩尔认为从“意识分析”到“语言分析”的语言学转向并未使西方哲学从根本上摆脱困境。语言分析哲学过多强调句法学和语义学,从而忽略了语用学。维特根斯坦、皮尔斯和奥斯汀与塞尔等虽重视语言使用的维度,但其语用维度不能反思性地结合到句法-语义结构的准先验功能之中,没有先验性的特征。“因此,莫里斯等人只能把语用学视为一种经验的行为主义,或者最好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形式语用学,即一种关于语言使用的经验的句法-语义框架的元语言学建构。”(Apel 1994: 135)这种语用学并没有将语用维度融入语形学和语义学的系统之中,从而也就不能在指称的证实过程中将因果性和意向性结合起来,不能对语言使用的维度进行反思性处理,不能处理符号过程的准先验功能。基于此,阿佩尔提出了先验符号学思想。他的先验语用学力图改变经验语用学的行为主义倾向,以求分析主体间沟通的普遍条件制约等问题。阿佩尔意识到,在先验语用学中语义框架实际上是解释世界的可能性

条件,对建构和解释世界的语义框架的哲学反思就相当于对解释世界的主体和主体间条件的先验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语义学框架建立在约定性的主体和主体间条件的基础之上,而约定性的主体和主体间条件其实是(先验)语用学问题(李红 2000: 37)。因此,他认为必须关注三元符号关系中的语用学维度,把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三个维度结合起来才能克服先验语义学的“抽象谬误”,才能真正解决一个关于真实所指对象的问题。一个符号的所指不仅是语义学问题,而且是语用学问题,必须有一个符号解释者的主体间性交往来保证,必须使名称的使用与情境相结合。因此,“我们对符号的所指的真正对象的认识就是显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能由语用学转向来完成,也即通过符号认识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综合维度来完成”(Apel 1994: 138)。三元符号过程三个维度的结合主要体现在理解意义的三个概念即外延、内涵和意向性上。阿佩尔认为这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语义学和语用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阿佩尔正是通过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语义学与语用学两个维度的有机结合。

2.1 内涵与主体意向性的关系

阿佩尔认为认知主体的意向性是不能从作为名称内涵的公共意义中分离出来的。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的意义“饱含人的因素”(李洪儒 2006: 29 - 33,辛斌 2006: 1 - 6)。语言的理想的、主体间有效的内涵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主体把握的,语言的意义部分地依赖于意义意向的人类主体的解释。“没有可能区分所指示东西的意向概念(将认识作为某物的某物)与作为名称内涵的公共意义概念。”(Apel 1994: 140)意向主体通过符号解释而享有公共意义。因为作为主体的人的个体意向性以蕴含于语言符号中的主体间性的公共意义为前提。如果我们不假设理想的语言符号的主体间合法意义内涵被作为意义意向的主体的人所理解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不同的人能就一个争论在主体间有效性上达成一致,也就是说每一个意义意向的主体将其意义意向贡献给公共的意义意向是可能的,否则我们不能理解人类经验能建立语言符号的公共意义意向的内容。只有借助意向性主体所构成的主体间约定,才能确定支持的真实所指对象,而且意向性个体保障了无限符号解释共同体的主体间有效性论断。这就展现出了不同类似个体可以形成保障知识主体间有效性的先验主体功能,符号解释的无

限共同体是意义意向和主体有效知识的明确的先验主体。由此看来,主观意义意向性与公共意义内涵的密切关系是语义学与语用学融合的必要前提。

2.2 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外延由内涵决定,并且都独立于主体意向性。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则认为,外延与内涵和意向性不同,外延优先于内涵和意向性,因为外延真正表现了事物的本质,而内涵和意向性只是知识的主观状态的表达。阿佩尔不认同上述观点,他认为外延、内涵和意向性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如果外延不为内涵所决定,它们就不是名称或语词的外延;如果外延能够完全从指称的意向性中区分出来,那么我们就不能认识外延所包含的任何东西,甚至不能意谓它们(李红 2000: 38)。他认为,对专名而言,指称外延的确定同时可以确定其内涵;对于通名而言,必须辅以对内涵的描述才能确定符号的外延;对于生活语言来讲,外延不能由一个语义学上定义的内涵来永远确定,因为生活语言的内涵和外延的语用学区别与语义学上的并不相一致。由此看来,“为了克服逻辑语义学的抽象谬误,在内涵和外延之间的语用学区别需要一种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实用主义完成”(Apel 1994: 146)。在某种意义上讲,指称中意义的确定需要意向性、内涵与外延的结合正好体现出语用学转向的必要性。

2.3 外延与意向性的关系

在外延与意向性的关系问题上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塞尔认为意向性等同于外延加内涵,普特南则以外延的指示性定义取代内涵。在阿佩尔看来,二者的观点是极端的。他认为符号理解的意向性必须与作为外延的意义的确定一致。意向性能够决定外延,正是意向性内容发展了超越语词实际内涵的外延意义的维度,并且影响着外延的确定。由符号定义的意向性内容必须与符号定义的术语外延保持准确的一致,否则它就无法满足其经验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阿佩尔认为必须将符号的内涵、外延和意向性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内涵与意向性密不可分,内涵与外延的关联使得外延和意向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只有在语义学维度中加入语用学维度,考虑符号使用者的意向性作用,才能完整地把握符号的意义。也就是说,对语用学研究的注重已是不争的事实,要使当代哲学走出困境,就必须将符号解释的语用学维度与句法-语义学维度有机结合起来,以语用学转向

来彻底完成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3 先验语用学的先验性

阿佩尔不满意康德的先验哲学。他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只是在先验主体或意识的可能认知对象的意义上考虑到了存在,只是将符号的所指和符号的解释者看做哲学的主题而没有考虑语言或符号本身。阿佩尔一生都致力于对其哲学的改造,力图赋予先验哲学以语用色彩,使其朝语用学方向发展。先验语用学构想下的先验性已经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意识的先验性了,而是关于语言交往共同体的能够保障知识有效性的一种经验的先验性。它是在自我反思的层面由不确定的语言交往共同体的作用而产生的。先验语用学的先验性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先天性与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验性上。

3.1 语言的先天性

方法论唯我论在主-客关系前提下,只注重句法-语义的研究,不考虑语用维度的研究,消除了包括语用学在内的语言整体功能的准先验地位,从而造成语言的所指可能没有时空中的真实对象与之对应,形成抽象谬误。因此,阿佩尔认为语言不应成为经验科学的客体和理论表述的工具,不应只被看做语义学研究的对象。语言不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或载体,而是以符号为中介的人类有效性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在交往共同体中语言不是作为工具,而是一种建制。”(Apel 1995: 24 - 38)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习得的任何一个词语都是社会互动的制度化规范的体现。作为连接主体与世界的中介,语言具有先天地位。这种语言的先天性是以符号为中介的知识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是先验语用学意义上的先验性。语言符号是任何事物具有意向意义的先决条件,是建构客体知识的重要预设。只有通过语言符号才能使一个主体的意向意义与别人的意向意义达成一致,从而实现意指某物。语言的先天性不仅与构成意义先天性的先于反思的生活实践相关,而且与形成有效性反思的先天自我意识的反思性相关。语言的先验功能将可能的现象形式赋予世界,并使时空中的事物成为主体间有效知识的对象。因此,语言的先验性不仅是知识可能的先决条件和理解世界的主要条件,而且形成了论证性话语中有关自我反思性思想的主体间有效性。阿佩尔认为,作为解释主体间有效表征的中介的语言功能原则上不能被客体化,我们不需要从语言之外的世界寻求根据,而是应该从主体间有效性

的角度来解释某物的可能性条件。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普遍性、规范性和客观性就来自于语言本身,来自于作为符号解释者的主体间的交往。

3.2 交往共同体的先验性

同时阿佩尔强调符号主体或使用者的作用,认为这些符号解释的主体构成了一个交往共同体。任何人就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来说,总是被包含在交往共同体中。作为符号解释者的认知主体必须将自己理解为先天的、真实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参与者。通过交往共同体形成的规范性对于认知个体来说具有一种先验作用。这是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先验性。在阿佩尔看来,交往共同体能够为论证提供规范的前提,是一种“制度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构建中,每个个体都已经被置于作为规范性前提的网络中,在交流论证中他们可以不断提出有效性论断。作为一个理想的控制机制,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前提,是每个人参与批判的前提条件,是克服语义学“抽象谬误”的关键所在。语言交往共同体是一种先验的视界,从而为语用学的先验性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与基础。为了证明这一点,“阿佩尔将先验性的希望寄托在语用学方面,也就是在语用学和先验性之间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关联性”(Bubner 1972: 76)。虽然阿佩尔意识到无论如何强调语言的语用维度的重要性,也未必能够必然地推导出先验性的存在,但是他认为“正是交往的先验性使得约定合理性成为可能,因为没有其他的交往能够给予这种理性约定的可能性”(Apel 1972: 24 - 38)。在语言交往之间形成的交往共同体是语词意义的先验条件。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性和知识有效性的真正条件是先验语言游戏,而语言游戏的实在基础就在于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中。“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验性实际上是理解社会功能和人本主义方法的充分基础。”(Apel 1972: 24 - 38)根据主客观关系层面上的观察而来的知识总是把作为主体间层面上的意义沟通的知识设为前提。

由此看来,符号学不但要赋予符号功能的语形-语义学部分以先验性,而且应赋予实际的语用学维度以先验功能,同时也应赋予符号解释的主体以先验性,这是自我反思式知识的保障与条件。

4 结束语

在对康德先验哲学改造的同时,阿佩尔批判地接受了皮尔斯等人的符号学思想。在融合先验

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的基础上,阿佩尔提出先验语用学思想。“先验语用学力图将思想或认识的先验主体转变为先验交往共同体,从而将先验意识哲学转变为先验语言语用学。”(Apel 1998: 53)先验语用学保留和发展了康德哲学式的先验性和规范性,以语言交往共同体概念代替了康德的先验主体概念,以主体间性取代了方法论上的唯我论地位,并将此与语言的使用维度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将康德的先验哲学与20世纪语言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结合起来,以“语用学转向”最终完成了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从哲学的角度讲,先验语用学架起了沟通欧洲大陆的人本主义解释学与英美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的桥梁,通过赋予符号学以先验性拓宽了语言哲学研究的视野。阿佩尔认为真正的解释学探究是处于与自然科学对事件对象的说明活动的互补关系之中的,这两种探究既互相排斥又相互补充。符号解释共同体总是自然科学实验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主体间的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决不能被还原为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论程序。语言性沟通与客观科学构成互补关系。从事科学的人类的交往共同体中的解释学沟通是描述性的说明性的科学的前提,解释学沟通中蕴含着经验分析科学。阿佩尔这种对大陆解释学传统和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融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补功能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虽然阿佩尔研究语言是在解决哲学问题,但是他对语言使用维度的深入系统的分析无形中为语用学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新兴学科的出现铺设了道路。他把辩证的哲学方法运用于现实交际社区和理想交际社区中,使先验语用学的研究方法成为当代语用学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对语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 阿佩尔. 哲学的改造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陈嘉明. 康德“图式”论的符号学分析 [J]. 厦门大学学报, 1991(4).
- 江 怡. 当代语言哲学研究: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 [J]. 外语学刊, 2007(3).
- 李 红. 现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李 红. 先验符号学的语用学转向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5).
- 李洪儒. 系词: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二 [J]. 外语学刊, 2006(2).
- 钱冠连.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尚晓明. 实用主义在哲学框架中的语言运作探索 [J]. 外语学刊, 2006(6).
- 辛 斌. 福柯的权力理论与批评性语篇分析 [J]. 外语学刊, 2006(2).
- 殷 杰 郭贵春. 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A]. 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 [C].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 张今杰 林 艳. 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研究 [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3).
- 张再林. 从康德到阿佩尔——先验自我还是无限交往共同体 [J]. 哲学研究, 2005(7).
- Apel, K O. *From Transcendental-Semiotic Point of View* [C]. Marianna Papastephanou: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 Apel, K O. *Selected Essays: Towards a Transcendental Semiotics* [M]. New Jerse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 Apel, K O. The Apriori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Humanities [J]. *Man and World*, 1972(1).
- Apel, K O. The Rationalit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nsual, Strategic and Systems Rationality [J].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1995(1).
- Bubner, R.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kman Books, Ltd Taipei, 1992.
- Searle, J. R.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1969.
-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收稿日期: 2008 - 08 - 14

【责任编辑 李洪儒】